

社會主義意識的認同塑造

——1950年代武漢的展覽會

• 洪振強

新生的現代國家政權比之傳統政權的一大不同，就是它剛建立時，對社會的控制不僅僅只是維護社會秩序和徵收賦稅，更多的是運用手中的各種權力資源，通過諸多方式營建自己的社會基礎。除了從中央到地方建立完整的行政管理體系外，更關鍵的是構建對新政權有着高度認同感的社會意識^①。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在此之後，新生共和國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通過自上而下的威權方式大力宣傳自己的意識形態，把社會主義意識滲透到社會每一個角落，構建全社會對新國家、新社會的認同，以營建、擴大和鞏固自己的社會基礎。

本文即以1950年代武漢的展覽會為例，分析共產黨是如何通過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營建和鞏固自己的地方社會基礎，促使整個社會意識轉向社會主義，從而構建地方社會對共和國社會主義新政權的認同。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9年的約十年時間裏，在武漢舉辦的展覽會至少有161個，其中很多展覽會都是交叉型的。不過，從泛政治化角度講，這些展覽會都帶有政治性，比如，美術、電影、文藝類展覽會均具有極強的政治宣教功能。

一 共和國新政權塑造社會主義意識認同的三種方式

1950年代，武漢作為中南區軍政委員會、湖北省人民委員會、武漢市人民委員會所在地，舉辦了各種各樣的展覽會。筆者依據在武漢發行的兩份最大的報紙《長江日報》和《湖北日報》，輔以湖北、武漢檔案館所藏的檔案資料，曾做了一個粗略統計：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59年的約十年時間裏，在武漢舉辦的展覽會至少有161個（不包括外國在武漢舉辦的展覽會），其中經濟類展覽會58個，政治類30個，文化教育科學類30個，社會類8個，軍事類5個，還有一些難以歸類的綜合性展覽會。當然，展覽會類型的劃分不是很絕對，很多展覽會都是交叉型的。不過，從泛政治化角度講，這些展覽會都帶有政治性，比如，美術、電影、文藝類展覽會均具有極強的政治宣教功能。

這些展覽會涉及的範圍很廣泛，政治、經濟、文化、藝術、衛生、教育、科學、軍事、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都涉及到了。這既可說明當時武漢地方社會

變動是全方位的，都可以通過展覽會體現出來，也可說明展覽會在武漢地方社會變動中發揮了廣泛的作用，其所承載的宣教意涵和意識形態塑造功能深入到了武漢地方社會的各個方面。可以說，武漢的展覽會在1950年代共和國塑造社會主義意識認同中起了重要作用，較全面地反映了共和國新政權在意識認同上營建和鞏固地方社會基礎的作為。

這些展覽會大致體現出了共和國新政權進行社會主義意識認同塑造的三種方式：

第一，榜樣激勵方式，即通過樹立建設社會主義的好榜樣，把蘇聯社會主義描繪為「新中國的遠景」^②，來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

共和國所追求的社會主義事業在中國是嶄新的，毫無實踐經驗，且新中國脫胎於一個經歷了一百多年衰敗的「舊中國」，統治基礎十分薄弱，還遭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封鎖，面臨嚴峻的國際政治和外交形勢。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必須向「老大哥」蘇聯學習，以蘇聯社會主義為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模本和榜樣。建國前夕，毛澤東就號召向蘇聯學習，「蘇聯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③中國應以蘇聯、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社會主義國家為榜樣，在學習它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的同時，更主要是以它們如日中天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指路明燈」，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從而凝聚社會的共同意識。

建國伊始，全國就掀起了學習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熱潮，其中一大舉措就是在全國各地舉辦有關蘇聯等國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展覽會。各級政府視這些展覽會為對中國人民「進行國際主義教育和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活動」，都「以高度的國際主義精神和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來辦理」^④。武漢地區也不例外，據粗略統計，在1950年代舉辦的此類展覽會有26次之多，其中有關蘇聯的展覽會不僅數量佔了約一半，而且規模比其他展覽會要大得多。

早在1949年武漢新政府建立不久，就相繼在漢口、武昌舉辦了蘇聯建設圖片展覽會，以圖片形式，展現蘇聯戰後恢復國民經濟、建設幸福生活的美好圖景，使得人們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就是「新中國的遠景」而大受激勵。當時的報導寫下了如此激昂的文字：「蘇聯——人類的希望，指路的明燈，引導着勤勞而勇敢的中國人民，昂首邁進！」^⑤

在這些展覽會中，最突出的是1956年武漢的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又稱蘇聯展覽會）。在武漢舉辦之前，蘇聯展覽會從1954年起曾先後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地舉辦過，觀眾都極為踴躍，展覽會達到了「不只是幫助中國觀眾增加了科學技術知識，也大大鼓舞了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的效果^⑥。湖北省、武漢市兩級黨政機關舉辦武漢蘇聯展覽會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使全市人民受到一次極為深刻實際的社會主義教育，同時進一步鼓舞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⑦。為了辦好這次展覽會，武漢地方各級政府實行全民總動員，不僅動員各黨政機關和市民積極參與舉辦展覽會，而且還積極動員湖北各地人民到會場觀展，接受社會主義教育。這種強大的社會動員，不僅增強了社會主義的凝聚力，而且把社會主義觀念深入灌輸給被動員者，無疑會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同，提高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

建國伊始，全國就掀起了學習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熱潮，其中一大舉措就是在全國各地舉辦有關蘇聯等國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展覽會。武漢在1950年代舉辦的此類展覽會有26次之多，其中有關蘇聯的展覽會不僅數量佔了約一半，而且規模比其他展覽會要大得多。

新中國採取了通過控訴敵對勢力的罪惡和醜陋的策略，貶抑對方，抬高自己。姑且不論這種控訴和貶抑是否符合事實，但它們達到了構建認同的目的，讓人們樹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適合中國，才能讓人們過上幸福生活的認識。

顯然，當新中國自身沒有現實版的社會主義事業教材時，就引進具有共同意識形態的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模本，作為榜樣展示給人們，猶如「畫餅」一樣，以此激發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這些展覽會所產生的榜樣力量催人奮進，給人以精神鼓舞和無窮力量，其所展示的社會主義經濟、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成就，「充分表明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⑧，必然會給武漢地方社會樹立一種標竿，成為武漢所夢想的「明天」，從而促使武漢地方社會全民動員，奮力奔向這一「明天」。這極大地凝聚了社會對新政權和社會主義的認同感。比如，各行各業觀看蘇聯展覽會後紛紛表示「一定要學習蘇聯人民艱苦奮鬥的精神，加速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為祖國的明天而奮鬥」^⑨。

第二，「新」「舊」對比方式，即通過控訴舊社會的罪惡，對比「資」「社」兩條道路，宣揚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正確性，從而更加堅定人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

建設社會主義，首先要樹立社會主義的正確性，確立「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新中國」的共同認識，讓人們認識到新生的共和國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取代「舊中國」是一種必然。新中國採取了通過控訴敵對勢力（包括舊社會殘餘勢力、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罪惡和醜陋的策略，貶抑對方，抬高自己。姑且不論這種控訴和貶抑是否符合事實，但它們達到了構建認同的目的，讓人們樹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適合中國，才能讓人們過上幸福生活的認識。

在1950年代，武漢地方社會視展覽會為「領導鬥爭，指導工作的有效方法」，認為通過展覽會，可以揭露敵人，控訴他們的罪惡，「揭示事實真相，駁斥他們的謬論，揭穿他們的陰謀詭計」，從而使人民「提高認識，鼓舞鬥爭，激發共產主義覺悟，加強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心和決心」^⑩，因此舉辦了不少把反帝、反封建教育和社會主義教育、愛國主義教育結合起來的展覽會。這些展覽會五花八門，大致可以分為五種情形：

(1) 揭發、控訴帝國主義的罪惡。比如1951年中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舉辦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展覽會，通過大肆揭露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罪行和仇視，特別是美國等帝國主義敵視新中國的行徑，一方面激起人們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另一方面激發人們對祖國的熱愛，高揚並利用民族主義來增強凝聚力，把社會主義認同和民族凝聚力相融合。有人認為這個展覽會是「很有效果的愛國主義教育的大課」，有着「重大政治意義和教育意義」，易使「親美、崇美和恐美的反動思想和錯誤心理被檢討清算」，建立「仇美、鄙美和蔑美的正確觀念和健康心理」，從而掃除民族自卑心，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為「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思想基礎^⑪。

(2) 揭露、控訴反革命份子的危害與罪惡。比如1951年中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和武漢公安總局聯合舉辦反革命罪行展覽會，通過揭露社會主義直接敵人反革命份子殘害革命人士、破壞新政權的暴行，既使人們仇恨反革命，又使人們產生對社會主義的無限同情，從而與新政府更為團結一心。有觀眾就表示一定要「鎮壓反革命，隨時隨地協助政府，檢舉特務，做好抗美援朝的工作」^⑫。

(3) 揭露不法資產階級份子對社會主義新政權的腐蝕與危害。比如1952年武漢反貪污聯合檢查委員會舉辦的「五反」展覽會^⑬。新中國開展經濟建設之初，社會上出現資本主義化現象，有損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這些展覽會展示「五

反]運動的成就和國家建設的美好前景，對資產階級的罪惡和危害進行揭露、批判和打擊，有利於人們認清資產階級的腐朽本質和醜陋面目，從而肅清資產階級思想，更為接受社會主義。

(4) 揭露、控訴地主階級的罪行。土地革命是中共革命的核心，其成功是共和國確立社會主義的一大基礎。對新生共和國兩大階級主人之一的農民兄弟而言，地主是萬惡之源，是其遭受苦難的主要根源，因此，非常直白地展示地主階級的罪惡既可讓農民階級有「翻身做主」的自豪感，也可清除小農思想，進行階級教育，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感謝心理，從而更嚮往社會主義社會。比如，1952年中南、湖北、武漢土地改革委員會聯合舉辦中南土地改革展覽會，其目的就是要進行系統的反封建政治教育，讓人們認識地主階級的反動本質及其殘酷、兇惡、腐化、無人性，樹立堅決消滅封建勢力和鞏固反封建勝利果實的決心，同時使人們了解勞動人民的優良傳統，認識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最終認識到共產黨土地改革的正確性，從而為國家經濟建設打下思想基礎^④。

(5) 對比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揭露資本主義的醜惡和危害。比如劉介梅今昔生活對比展覽會。新中國建立之初，雖然在政權機構層面邁向了社會主義，但在經濟建設領域，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爭，且人們生活思想層面還存在不少的資本主義成份，包括謀利、追求物質享受等，這些都會導致社會主義意識認同的弱化，不利於新政權的鞏固。劉介梅是湖北黃岡縣的一名農民，建國前討米為生，及後乘土改翻了身，但他發家致富後，卻滋長了富農思想和資本主義觀念，不加入人民公社，拒絕走合作化、集體化道路，抵制國家統購統銷政策，後來經過教育才改變思想，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劉介梅的事例被當作「翻身忘本」和「忘本回頭」的典型在北京、濟南、武漢等地展覽，其目的就是要在社會上加強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清除資本主義思想遺毒。這個展覽會被賦予了極強的思想政治內涵，肩負起了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時代使命，即「搞臭資本主義思想，保衛社會主義的革命道路」^⑤。

這些展覽會展示設計的意涵基本有三部曲：第一，是展示各種敵對勢力「血淋淋」的罪惡，以極其誇張的方式把帝國主義和各種封建舊勢力殘害中國人民、敵視新中國的各種殘暴行徑直接展現給廣大人民群眾，以襯托出共產黨、社會主義的「救世主」身份，強調社會主義新政權是一種必然，對勞苦大眾而言就是「解放」和「新生」；第二，是展示祖國的美好，激發民眾的民族主義情感，發揚愛國主義精神，並強調共產黨、社會主義與新中國是三合一、緊密聯繫的，宣教「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新中國，就沒有幸福生活」的觀念；第三，是展示社會主義的正確性和優越性，強化只有在社會主義之下，才能建設偉大祖國，才能過上幸福美滿生活的觀念。

有如此展示設計的展覽會，無疑會強化社會主義的正確性與優越性，使人們在進一步記住舊社會和資本主義的罪惡與醜陋、增加對它們仇恨的基礎上，受到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提高社會主義覺悟，對社會主義新社會更加嚮往，從而使共產黨新政權得到人們的更加擁護，社會基礎會更加堅固。比如，有人觀看中南土地改革展覽會後明確表示：「〔展覽會〕使我更具體地了解到人民當家作主的意義。我們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要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爭取世界持久和平」^⑥；有人看了劉介梅今

劉介梅的事例被當作「翻身忘本」和「忘本回頭」的典型在北京、濟南、武漢等地展覽，其目的就是要在社會上加強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清除資本主義思想遺毒。這個展覽會被賦予了極強的思想政治內涵，肩負起了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時代使命。

昔生活對比展覽會後向社會號召：「我們要永遠保持思想上的純潔，樹立社會主義思想，為我們幸福生活的源泉——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貢獻一切力量。」^⑦

第三，建設成就激勵方式，即通過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以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建設巨大成就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

凝聚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同，構建共和國地方社會基礎，必須要用事實說話。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只是「新中國遠景」，只能算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榜樣，而不是中國自身建設社會主義的現實成就，其榜樣的力量必須落實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上才具有實際意義。同樣地，敵對勢力的腐朽和罪惡，只是從對立面襯托出了社會主義的正確性，說明選擇社會主義是唯一的必然結果，但要真正地顯示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說明社會主義適合中國，能給人們帶來幸福生活，還必須要靠實實在在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因此，新中國建立之後，在開展社會主義革命，鞏固新政權，建立社會主義之同時，就開始大力進行奔向社會主義的社會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以熱火朝天的建設場景和巨大的建設成就來增強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強化人們對社會主義和共和國新政權的認同。

新生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通過眾多展覽會展現出來了。1950年代，在武漢舉辦的有關經濟建設、社會建設的展覽會是最多的，佔了展覽會總數的四成多，涉及生產建設、貿易流通、生產技術、工業、交通、農業、財貿、水產等諸多方面，也有以經濟為主的建設成就綜合展。這些展覽會試圖通過展示美好的祖國和在共產黨新政權領導下開展建設的熱火朝天、蓬勃發展的景象，給人以建設新生活、奔向社會主義的精神鼓舞，在充滿希望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凝聚人們的社會主義信念。比如湖北省人民委員會於1956年舉辦的工農業展覽會，「用具體生動的實物、模型和數字展出我省幾年來工農業生產建設的成就，反映農業合作化高潮所帶來的工農業生產建設的新高潮」，從而「更加鼓舞我們從事生產建設的信心和社會主義的勞動積極性」^⑧。

這些展覽會還通過集中展示祖國豐富的物產資源，向人們詳細介紹土特產的現狀，既便於人們了解各地物產狀況，找準發展經濟、開展建設的方法，又能給人以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緊迫感和信心。此外，這些展覽會還通過展示各條生產戰線上勞模的事迹和工人生產經驗，體現工人階級的力量，以激發人們的勞動積極性。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展覽會十分善於貫徹共產黨新政權的方針政策，開展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政治教育，使得經濟建設、社會建設變成了一種政治運動。比如，1959年湖北省十年經濟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以「鼓足幹勁，教育群眾」為指導思想，在展現十年來湖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之中，突出表現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三面紅旗」的偉大勝利^⑨。這個展覽會使廣大幹部群眾接受了「一次深刻而具體的總路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教育他們要堅定意志，「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發揮更大的積極性，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更巨大的成就」，並「和當前的生產、工作緊密地結合起來，……進一步促進正在蓬勃開展的反右傾、鼓幹勁、全面增產節約的運動，……為1960年的更大躍進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⑩。可見這個展覽會把黨和政府的政策方針和當時的社會運動展現得淋漓盡致。

1950年代，在武漢舉辦的有關經濟建設、社會建設的展覽會是最多的。這些展覽會試圖通過展示美好的祖國和在共產黨新政權領導下開展建設的熱火朝天、蓬勃發展的景象，給人以建設新生活、奔向社會主義的精神鼓舞。

總的說來，通過這些展現社會主義建設場景和建設成就的展覽會，共產黨新政權既貫徹自己的各項政策，又調動和發揮人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對人們進行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把加強人們的社會主義認同意識和動員人們參與社會主義建設結合起來，不僅可以落實方針政策，而且可以加強人們對這些方針政策的認同，從而使得整個社會都嚮往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可以說，展覽會成為了共產黨推行各種政策、開展政治運動的一種工具，在強化社會對社會主義新政權認同之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 共和國新政權社會主義意識認同塑造的特點及影響

如前所述，在共和國新政權威權管治下的這些展覽會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了，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展覽展示的平台，更多的是一種社會主義宣教的工具。誠如時人所言，展覽會是「教育我國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政治鬥爭、生產鬥爭、思想革命」和「進行無產階級唯物主義世界觀教育」的強有力的工具，「是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教育的陣地，是群眾學習文化技術的學校」，任何展覽會都「忠實的為當前的政治經濟建設服務，從各項事業、各個方面、各個角度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及其所取得的巨大事業成就和科學技術水平」^②。通過這些展覽會，官方主辦者可以向社會宣教，而參觀者和社會大眾可通過展覽會及與之相關的各種宣傳，主動或被動地得到受教，從中二者的意識逐漸得到合一。

無論是就展覽會整體還是就具體的展覽活動而言，它們都被賦予極強的政治性。展覽會整體而言，都具有宣傳共產黨政策的意旨，有着很強的社會主義政治目的性，基本與政治配套而行，甚至有的展覽會就只是為了宣傳政治。比如，1954年3月舉辦的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任務圖片資料展覽會，其目的僅僅是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說明只有共產黨領導，才能勝利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強調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加強共產黨集中領導的重要性^②。

至於具體的展覽活動，都會緊緊圍繞着進行思想和政治教育的宗旨，使得政治化色彩深入到展覽會的各個環節。比如，關於展品，其形式非常多樣化，既有實物，也有以藝術手段創作出來的圖畫、連環畫、雕塑、模型等「非實物」展品，有的展覽會甚至沒有一件實物。因「展覽內容設計的政治思想性問題，是關係到一個展覽會的成功與否的根本問題」，所以在徵集展品時都經過嚴格選擇，有着明確的目的性^③。特別是那些非實物展品，基本都受到了意識形態影響，着重強調教育的功能。

關於會場布置，有的展覽會專門布置成為富有教育意義的展館，要麼是揭露、控訴敵對勢力的罪惡和舊社會、資本主義的腐朽，要麼是大力讚揚工農群眾的勤勞勇敢、共產黨的英明領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等等，規模稍大的展覽會會懸掛毛澤東及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畫像，以及諸如「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之類的標語和體現政治運動及政策方針的標語。

無論是就展覽會整體還是就具體的展覽活動而言，它們都被賦予極強的政治性。展覽會整體而言，都具有宣傳共產黨政策的意旨，有着很強的社會主義政治目的性，基本與政治配套而行，甚至有的展覽會只是為了宣傳政治。

關於講解工作，這是展覽會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展覽會一般都會派講解員到現場對展品進行詳細講解，向觀眾分析通過直觀展覽所難以展示出的思想內涵，實現展覽會教育的真實性與思想性高度統一。講解員是經過專門挑選和培訓的，講解內容也是事先根據展覽會的思想教育目的精心準備好的，既要講解展品的技術性內容，也要講解其背後的思想，而以後者最為重要，「做好一個講解員最根本的條件，是政治必須掛帥。搞好講解工作最根本的東西，是加強政治領導」^{②9}。

關於宣傳工作，展覽會都很重視宣傳，會通過報刊、電台、演出、放影片等眾多形式加強宣傳，以實現展覽會的思想教育目的。比如，1953年中南區少數民族文物圖片展覽會邀請中南民族歌舞團舉辦了24場演出，各電影院、電教隊、文化館放映了133場電影和無數的幻燈片；此外，全市的街道以及單位的櫥窗、廣播都宣傳民族政策，不少單位還與少數民族舉辦民族聯歡晚會^{③0}。這些多樣化的宣傳必然會使共產黨的政策和意識深入到社會的諸多層面。

關於組織動員工作，這些展覽會基本都是官辦的，由黨政機構和各單位自上而下地發動組織，極少民間社會自發自主行為，甚至有的展覽會還專門組建黨委，達到「黨政一體化」。這種高度集中的組織動員無疑會增強社會主義凝聚力。

關於組織觀眾參觀工作，展覽會對觀眾基本是「採取自下而上的廣泛發動、全面組織與自上而下集中統一安排相結合的辦法」^{③1}。因此，觀眾大部分都是經過組織動員的，而且，參觀與專業學習、思想教育相並行，觀眾參觀後要根據自己的工作實際和思想狀況，寫參觀心得和開展座談會。通過這樣的動員，展覽會能把社會主義教育落實到每個參觀者的思想中，實實在在地增強他們對共產黨和新社會的認同感。

這些展覽會被高度政治化後，基本形成了大體一致的操作規程和統一的思維模式：先是應某一政治運動或黨政的需要而提出，隨即由相應的黨政機構開始籌辦，一般籌辦時間都比較短，大多一二個月，長者也不過半年多時間；徵集展品主要以實物、圖表、模型和圖畫為主，如舉辦同質性的展覽會，其展品可以相互使用，類似於巡展。開幕式時，黨政領導要到展覽會會場講話剪綵，會場布置、展館設計都有統一的指導思想，只是根據具體的目的而有所不同，規模稍大的展覽會會組建黨的組織，組織專門的學習討論活動，既可讓參觀者學習專業知識，又能加強對他們的思想教育，還會對展品進行講解，闡釋其思想性。參展和辦展在展前要擬定方案，闡明其目的和意義，展後要寫工作總結，說明其成效及經驗教訓，並分析其原因，而對展品極少進行優劣分析，更沒有組織專家進行審查評獎，展品的科學性被忽視了。

這些高度政治化的展覽會毫無疑問強化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展現出了共和國新政權塑造社會主義意識認同，營建和鞏固地方社會基礎的基本做法。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五點：(1) 加強社會主義教育，增強社會主義信念；(2) 堅持共產黨領導，跟着毛澤東、共產黨走；(3) 時刻抓階級教育與階級鬥爭，從對地主富農、各類資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對美帝國主義和各類反革命份子進行揭露、醜化、批判和鎮壓，到在黨內和人民內部開展整風運動，清算所謂

關於組織動員工作，這些展覽會基本都是官辦的，由黨政機構和各單位自上而下地發動組織，極少民間社會自發自主行為，甚至有的展覽會還專門組建黨委，達到「黨政一體化」。這種高度集中的組織動員無疑會增強社會主義凝聚力。

的「右派」，以及批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和事；(4)鞏固工農聯盟和民族團結，加強城鄉一體化；(5)學習蘇聯，以蘇聯為榜樣和社會主義的「光明圖景」。

這些做法不是只停留在政策和政治運動層面，而是深入到社會日常生活之中，強化一切為政治服務，一切工作都以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為中心，以思想政治教育優先，都要有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體現社會主義的正確性，為社會主義和偉大祖國服務。即便普通人民的日常家庭生活也不例外，比如，1957年武漢舉辦了幾個勤儉持家展覽會，目的是通過展示勤儉持家的實物，開展「五好」教育，既顯示共產黨新中國對普通勞動人民的尊重和關心，也提倡了社會主義新風尚，有觀眾就說：「在共產黨領導下，縫縫補補還拿出來展覽，是多麼光榮啊！」^⑦

然而，這些被賦予濃厚政治色彩和重大政治使命的高度工具化的展覽會，在「政治掛帥」、具有濃厚「革命」氛圍的1950年代，也容易產生「過火」的效果。過份強調展覽會的政治正確性，而忽略展品及其所承載內容的真實性，使得展覽會很大程度上成為了一種道具。這種道具更多不是在於促進社會發展，而是在於給人以思想教育，給人以精神鼓舞。這些教育和鼓舞與社會上開展的政治運動和共產黨的宣傳動員相輝映，容易給人以忽略客觀實際、跳越現實的精神力量，從而導致「左」的傾向。從全面學習蘇聯，到「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十二年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十五年趕超英國」；從以各種方式揭批反動勢力，到宣傳「兩條道路」、挖掘資產階級思想根源；從強調依靠工農聯盟、面向農村開展工業化，到以大躍進方式開展技術革命、文化革命，等等，都體現了一種「左」的變動傾向，特別是，這種「左」不僅僅出現在黨和國家的上層政治活動領域，而且幾乎開始成為一種社會現象，成為社會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開始具有濃厚的生活基礎和牢固的運作機制，因而可能會產生更為持久並深遠的影響。

通過眾多形式多樣的展覽會，共產黨新政權把社會主義意識從上到下，擴展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社會的方方面面，乃至深入到了社會最基層，即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得社會主義不僅僅作為意識形態成為國家和社會的共識，而且幾乎成為社會大眾的一種慣性思維和行為標尺，從而影響到幾乎是每一個人的生活 and 社會行為。這種全方位、多層面、強有力的社會主義意識認同塑造，使得新生共和國在建立政權機構和規範統治秩序的同時，從文化心理意識構建起了整個社會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從而使得其政權統治基礎更加牢固，所運作的社會動員更有效能。這為各種政治運動提供了文化意識基礎，使之聲勢更為磅礴，影響更為深遠。

從這個角度講，文化大革命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就埋下了伏筆，中國共產黨在1940年代整風運動中從黨內思想根源上做了清算的「左」，到1950年代後開始轉向文化意識上，通過社會主義文化意識形態的「左」來影響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社會文化意識形態中的「左」和共產黨政策方針上的「左」相互促進，相互強化，使得「左」從共產黨內擴展至黨外，深入到社會各方面、各階層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認同上，並迅速蔓延到整個社會，從而使其影響的深度和廣度要遠超以往。文化大革命超越中共黨內和國家政治層面，而具有社會性，成為一場全社會所謂的「革命」，其根源亦在於此。

通過眾多形式多樣的展覽會，共產黨新政權把社會主義意識從上到下，擴展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社會的方方面面，使得社會主義不僅僅作為意識形態成為國家和社會的共識，而且幾乎成為社會大眾的一種慣性思維和行為標尺。

註釋

- ① 此觀點受到美國著名漢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啟發。在杜贊奇著，王福明譯：《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中，作者提出了「國家政權內捲化」和「鄉村文化權力網絡」的觀點，認為民國政權為加強對社會的控制和徵收賦稅，把行政權力觸角深入到基層鄉村社會，實現了「自我膨脹」，雖然財源增加了，但與基層鄉村社會的矛盾卻日漸尖銳，其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力不增反減，而鄉村社會卻有着自己的一套文化認同，按固有的文化權力網絡繁衍生息。由此我們可以聯想到，新生的國家政權要想加強對地方社會的控制，實現新政權與社會的合流，除了建立各種權力機構之外，更主要的是要從文化與意識上塑造社會對新政權的認同。以此觀照1949年之後的中國，新生的共產黨政權之所以能夠迅速確立自己的社會基礎，除了完全摧毀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政權機構和社會制度外，還善於用一種嶄新的意識形態去改變舊有的社會文化網絡，通過強制的意識形態教育，構建社會對共產黨政權的文化意識認同。
- ② 〈蘇聯建設圖片展覽三日 近萬人湧往參觀〉，《長江日報》，1949年12月25日，第4版。
- ③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1481。
- ④ 〈關於來華展覽巡迴展出工作的幾項規定〉，湖北省檔案館檔案，SZ142-4-92。
- ⑤ 通訊員：〈他山之鏡——蘇聯建設圖片展覽會雜記〉，《長江日報》，1949年12月27日，第8版。
- ⑥ 〈蘇聯展覽會在北京、上海、廣州展出簡況〉，《長江日報》，1956年5月4日，第2版。
- ⑦ 〈關於蘇聯展覽館在武漢展出問題〉，湖北省檔案館檔案，SZ34-3-52。
- ⑧ 〈蘇聯展覽會各類專業學習全面展開〉，《長江日報》，1956年5月21日，第2版。
- ⑨ 〈學習蘇聯，建設我們的祖國〉，《長江日報》，1956年5月25日，第2版。
- ⑩⑪⑫⑬⑭ 湖北省十年經濟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集體創作：《展覽藝術初步》(初稿)(武漢，1960年10月)，前言；前言、頁3、1；16、30；104；119。
- ⑮ 〈把愛國主義思想教育提高一步——祝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展覽會開幕〉，《長江日報》，1951年3月7日，第1版。
- ⑯ 〈反革命罪行展覽會延期〉，《長江日報》，1951年5月31日，第3版。
- ⑰ 〈武漢市五反展覽會延期至本月廿日結束〉，《長江日報》，1952年6月13日，第3版。
- ⑱ 〈中南土地改革展覽會昨日揭幕，鄧子恢副主席的講話全文〉，《長江日報》，1952年10月4日，第1版。
- ⑲ 陳仲萊：〈劉介梅今昔生活對比展覽會的思想性〉，《長江日報》，1958年8月13日，第2版。
- ⑳ 〈土地改革展覽會教育了我們〉，《長江日報》，1952年10月30日，第2版。
- ㉑ 〈看劉介梅檢查自己〉，《湖北日報》，1957年10月25日，第2版。
- ㉒ 〈湖北省工農業展覽會正式開幕〉，《湖北日報》，1956年4月2日，第1版。
- ㉓ 曾惇：〈湖北省十年經濟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籌備經過〉，《長江日報》，1959年9月29日，第4版。
- ㉔ 〈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光榮旗幟繼續躍進——湖北省十年經濟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宣傳提綱〉，湖北省檔案館檔案，SZ119-2-96。
- ㉕ 〈總路線圖片資料展覽會今日開幕〉，《長江日報》，1954年3月11日，第1版；伊安：〈一課具體生動的總路線教育〉，《長江日報》，1954年3月23日，第3版。
- ㉖ 〈中南區少數民族文物圖片展覽會勝利閉幕〉，《長江日報》，1953年8月5日，第1版。
- ㉗ 〈武昌區婦聯舉辦勤儉持家展覽會〉，《長江日報》，1957年8月21日，第2版。